目　录

迎接南下工作团，会师石湾……谭安驭（1）

衡东机油泵厂发展史略……郭炎成（7）
回忆原衡山的农业合作化运动……罗　辉　曹德荪（12）
四十年来衡东粮食生产大发展……唐德荣　萧高才（26）
艰苦奋斗展宏图……周先谅（41）
——衡东人民开发利用涔水资源
桔冲油茶发展简介……李楚元（50）
衡东供销合作社的成长和发展……赵龙魁（56）
大浦米市……罗宗庭（63）

南下工作的初期……聂魁芳（66）

记一所农民业余学校……谭尹闻（81）

怀念先父罗芳圭……罗本忠（88）
大桥乡抗日自卫队的始末……夏正宗　夏中文（92）

我国最早的革命银行
——柴山洲特别区第一农民银行……萧　汉（96）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南湾地方的武装斗争…… 刘燕南　董月秋（112）
元代状元何克明…… 李楚元（116）
明代忠诚伯茹瑺…… 谭庆麟（119）
太平军义士阳大毛…… 立　言（121）
清代名医李纪方…… 刘植佺（126）

工程师刘铁岩…… 宋忠群　刘植佺（129）
著名中医李石城…… 剑　刚（131）

孔子后裔迁居杨桥的经过…… 孔仁和（135）
岳飞的后代是怎样来沈陂落户的…… 笔　心　何昌荣（137）

昔日名胜——灵山…… 陈昌年（139）
昔日的将军庙……颜添光　颜昌琪（141）

编　后…… （145）

迎接南下工作团，会师石湾

谭安猷

四十年前的今天，衡山解放了。但是衡山县全境的解放是分两个阶段：１９４９年８月７日，首先解放了湘江以东、洣河以北地区（今衡东县北部）；继而在１０月６日，衡宝战役胜利后，衡山全境才获得解放。从８月初至１０月初，人民解放军与国民党军两军隔江隔河对峙，相持两个月，因而斗争极其尖锐复杂。

在８月７日前两天，长沙宣告和平解放，人民解放军就继续南下，沿粤汉路直取衡山，七日到达石湾，解放了湘江以东、洣河以北地区。由于战略关系，即不迫使敌人迅速向粤桂两省逃跑，所以我正面部队到此就停止前进，以便组织衡宝战役，将白崇禧的主力歼灭在湖南。然而白匪仓皇南逃，国民党五十八军溃退到南岳至衡阳一线，眼看追兵未至，又妄图负隅顽抗。此时，刘东安同志从县城赴南岳，在实验小学召开了县工委会。他在会上分析了形势，使同志们明确了任务。我们一致认为解放军进入湖南，势如破竹，形势正在急转直下，衡山县的解放，指日可待，我们要加紧准备“迎解支前”；但是国民党五十八军仍盘踞南岳，恐其作垂死挣扎，我们必须提高警惕，针对蒋介石的残酷镇压政策，我们应坚决实行“疏散隐

蔽，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那时，国立师范学院目标最大，县工委会决定立即将已暴露的同志疏散隐蔽，岳云中学，可以分批进行，此项任务由熊家宽同志和我负责执行。许多同志认为刘东安同志应迅速返回县城，探明河东（即今衡东的沐北）情况，相机处理。会议很快结束，大家分途进行。时日已西斜，兵马拥塞长衡公路两旁，刘东安同志不顾个人安危，不管天黑路远，急忙上路，直奔县城而去。

我们立即将会议决定通知岳云支部，同时研究国师疏散的具体方案：先由熊家宽同志通知国师党员吴若虚、刘鸿藻、李寿彰，团员刘欣森，以及国师附中党员傅克刚等共7人，于黄昏时到达“实小”，再由我带到附近农村中何欣光同志家暂避一晚，然后撤退。当我们一行七八人急忙来到何家时，不料那里已住满了国民党军队，我们只得折回“实小”，然后撤退到南岳后山团员易育林同志家里隐蔽起来，并嘱咐他们：不得到通知，不要返校。

由于解放军停止正面进攻，国民党军得以暂时喘息。原先当国民党军大溃退时，县长王紫剑逃到南岳，只在汽车站住了一夜，就逃到衡阳去了。此时，白崇禧又委派左大凌为县长，拉起“反共救国军”的破旗，在南岳招兵买马。国民党县党部书记长丁香芹也从城关窜到了南岳，拼凑“视导组”，拉拢青年，搞特务活动，妄图伺机反扑。他们勾结国民党五十八军驻扎在“实小”的一个团部，于8月28日深夜，突然包围国师及其附中，搜捕了进步师生32人（其中党员2人，而且1人是县工委）。翌日凌晨，32人被押解到“实小”中山堂。我闻讯，深恐组织遭到破坏，后果不堪设想，就与何欣光同志研究，立即采取紧急措施。我们通知其他同志潜伏隐蔽，必要时

可向解放区撤退，又发动学校负责人和社会知名人士营救被捕师生（后因敌人找不到任何证据，先后释放了），“实小”由黄森杰同志负责，同留下的教师护校。组织上决定，我暂时离开南岳，设法找到刘东安同志。教师王文炯家住沙泉铺，我就以访友为名，随他绕道避开国民党军队。３０日抵王家，３１日经石桥铺过河到三樟树（今衡东县三江乡），９月１日抵达石湾，会见了刘东安同志，互相通报了情况。原来他从南岳返回县城后，探明河东已经解放，即设法突破国民党五十八军的封锁线，绕道左家山过河，展转至石湾。根据省工委的部署，他以县工委负责人身份，公开出面与解放军一三七师建立联系，发动群众，成立河东工作队，进行迎解支前工作；同时成立河西工作队一、二两个队，协助解放军搜集情报，进行打击、瓦解敌军等项工作。当时他苦于任务繁重，人力单薄，只盼望南下工作团快来，但自己无法分身前往；见我到来，喜出望外，要我赶快赴长沙向省工委报告，迎接南下工作团迅速来石湾开展工作。于是，我便于９月３日，和康华林同志一道步行至渌口搭火车，４日，抵长沙，向省工委周礼书记汇报了衡山的情况。周书记介绍我去株洲与衡阳地委接头，常杏云同志要我随同衡阳地委宣传部李朋副部长一道前往，同时把疏散到长沙的吴若虚、李寿彰、黄显孟、熊仲元、刘流、胡灏等同志带回衡山。我们一行于六日到达株洲，衡阳地委和衡山县委热情地接待了我们。他们都住在兵工厂的大厂房里，开着地铺，值炎天酷暑，旅途艰苦，却仍然让出蚊帐和铺位给我们住宿，阶级友爱，感人至深。衡山县委听了我代表县工委前来迎接他们，非常高兴，立即决定率领全体南下同志与我们一道，在解放军的护送下，昼夜兼程来石湾。经过两天的长途跋涉，于九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月九日抵达目的地——石湾。当晚，县委书记李心田、副书记王天华、组织部长王兴保、宣传部长高宝中、县长高怀亭、公安局长王福锁、武装部长路宜枝和县工委书记刘东安、组织部长谭安猷第一次见面，互相交谈情况，研究了一些问题，决定在11日召开南下同志与我们地下工作同志的会师大会。到了11日，会场设在石湾中心小学，四周贴了标语，显得很庄严隆重。南下干部和在石湾的地下工作党员、团员以及青年工作队（30余人）共200多人，欢聚一堂，举行盛大的会师大会。会议由王天华副书记主持。首先讲话的是李心田书记，他阐述了当前的形势和任务，强调南下工作同志和地下工作同志要团结合作。接着，县工委刘东安书记致欢迎词，并详细介绍了当时衡山的情况，要求地下工作的同志要向南下同志学习，取长补短。还有高怀亭县长及其他同志相继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非常激动人心。

13日，首先在石湾成立衡山县人民政府，张贴了由政委李心田、副政委王天华和县长高怀亭署名的第一号布告，接着第一区（石湾）人民政府也宣告成立，全镇人民欢欣鼓舞，奔走相告。除石湾外，还有白莲、草市、吴集、大堡、南岳、白果等6个区（全县共7区），地方同志首先被分配到已解放的几个区，昼夜奔赴各地开展工作。

为了解决干部问题，县委决定在石湾开办第一期干部培训班，招收知识青年进行培训。宣传部干事牛占耀同志和我负责训练班的管理工作，县委还选派了地下党团员熊清泉、刘欣森等同志担任班长。县委主要领导李心田、高怀亭讲课，内容主要是关于人民民主专政问题，教育青年分清人民和敌人，以及树立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因语言不通，我经常作些辅导工作。

知识青年接受训练二十多天后，县委即分派他们到各区去作征粮支前工作。

由于敌人在石湾对河经常鸣枪骚扰，为了安全起见，我们搬到茶子山李家大屋。10月6日，正是中秋节，我们吃了午饭，忽闻喜讯：衡宝战役胜利，敌人溃退，衡山县城解放。我们随即过河，进驻县城。为了迅速解放南岳，在高怀亭、王天华两位同志的带领下，刘东安同志和我以及十几名干部，随同一个连的一百多名解放军，于黄昏时分，马不停蹄地继续向南岳进发。天黑时才抵达南岳东操坪实验小学。为了搞清镇上的情况，我把留在"实小"的教师叫出来进行询问，又将住在附近的学生家长谭又桂找来，要他到镇上把镇长康铭贼来见解放军。谭又桂把镇长找来了，镇长陈述了情况，说镇上驻有刘超的部队，我们当即要康铭通知刘超等人前来听令。康铭去后不久，我们忽闻枪声大作，解放军迅速作好战斗准备。一会儿，四周平静，刘超、谭亚金等人来到了我们面前，原来枪声是他们迫使驻扎在祝圣寺内的警察缴枪时打响的。为了避免冲突，经协商，刘超部队立即撤离南岳镇，开往汽车站待命，解放军当晚即进入南岳镇。10月7日，南岳区政府成立，开始接管工作，我和民教科长李宝一同志，接管了在南岳的岳云、南华、五四等中学和省立南岳实验小学，以及省结核病防治医院。

南岳解放后，全县其它地方也相继解放了，各区干部陆续进入各自管辖的地区，县委的注意力主要转向建立基层政权，进行征粮剿匪等方面，我仍在县城继续参加办理第二、三、四期干训班，培训了一大批知识青年干部。1949年底，刘东安同志和我被任命到县人民政府工作。当时县政府的机构和主

要负责人是：县长高怀亨、副县长刘东安、秘书张振汉、民政科长李宝一、文教科长谭安猷、建设科长贾廷彦、财粮科长崔林斌、工商科长韩澄、银行经理张柄枢等。至此，县工委宣告结束，我们也踏上了新的征途。

衡东县机油泵厂发展史略

郭炎成

衡东县机油泵厂是一个具有四十多年发展历史的老厂。四十多年来，这个厂由４０名职工，几台陈旧设备的私营企业，已发展成为拥有职工４００多人，固定资产７００多万元的县办骨干厂子。

（一）

机油泵厂的前身是１９４７年私人合股开办的民生工厂。时值抗日战争胜利之后，百废待兴，衡山县城向东芹联合七个同行业的人，合股办起了“衡山民生工厂”，从事发电、碾米、锯木和手工生产印泥盒。他们雇用职工（包括学徒）４０人，购置了两台４０马力的煤气机和一台６０马力的蒸汽机，还有一台１０千瓦的发电机，白天碾米、锯木，晚上发电照明。

由于国民党政府在八年抗战后又挑起内战，致使经济萧条，通货膨胀，给刚刚诞生的民生工厂的发展前景蒙上了一层阴影。加上工厂常因设备故障停工停产，后来仅靠碾米供应部分私营米店，以维持职工的生计。１９４９年湖南和平解放时，工厂已濒临崩溃的边缘。

郭炎成：１９４８年在民生工厂工作，现任机油泵厂党委书记、厂长。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二）

1949年10月6日，原衡山县全境解放后，人民政府挽救了衡山民生工厂。1950年初，开始实行公私合营，名叫“公私合营衡山县利民工厂”，由旷文兰担任经理，资方派出代表管理财务，原有人员一律留用，仍然从事发电、碾米、锯木。同年12月，根据生产发展的需要，经公私双方协商同意，进行清资退股，利民工厂转为“地方国营衡山县电力公司”。1951年，由县人民政府投资，电力公司在原厂址上兴建700平方米厂房，安装一套75千瓦蒸汽发电机组，随后又增加一台90马力的煤气机，职工增至60人，于是扩大了碾米、锯木和发电照明业务。

随着生产的不断发展，1955年，碾米车间职工20人从电力公司分离，另建城关大米厂，但碾米动力仍由电力公司供应。1956年，电力公司增加两台金属切削机床、一台刨床、一台钻床和一座翻砂炉，由发电、锯木发展到农机农具的修制，同时，电力公司更名为“地方国营衡山县联合企业”。次年，联合企业的发电车间，单独建成火力发电厂，于是，联合企业又改名为“衡山县农业机械厂”，从事修制农机具，为农业生产服务。

1958年，在“大跃进”的形势下，原衡山县委根据“大办工业”的要求，将城关铁木手工业生产合作社并入农械厂，随后又将沙头、沙泉、吴集、草市等地的铜铸厂也合并转入，增加翻砂铸件的生产。这时，职工发展到500多人，厂子又改名为“衡山通用机械厂”。由于盲目冒进，严重脱离实

际，所以设备、技术、原材料都跟不上去，生产萎缩，给工厂造成了一定的损失。１９５９年下半年，工厂被迫精简人员，只得仍改名为“农业机械厂”。

１９６１年，原衡山县开始贯彻中央提出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县委对全县的地方国营工矿企业实行“关、停、缩、并、转”的办法进行调整，再一次对县农业机械厂精简人员、缩小规模，最后只留下４６人搞农机修理业务，维持开支，保住厂子。

１９６２年以后，随着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农业机械厂改为农机修造厂，并从其他单位调来了１０多人，充实力量，继续生产农机、农具，为农业生产服务。后又根据需要，修造厂逐年招收部分新工人，到１９７０年，有职工１２０人。

（三）

１９６６年３月，原衡山县的湘江以东部分建立衡东县，由于行政区划的变更，原衡山县的农机修造厂更名为“衡东县农机修造厂”。不久，“文化大革命”开始，无论衡东、衡山的企业差不多都先后陷入瘫痪状态。在这种严峻形势下，惟独衡东县农机修造厂顶住了“文化大革命”的干扰，坚持正常生产，并于１９７０年开始试制机油泵。

为了适应新产品机油泵上马的需要，在当时的条件下，职工们自己动手，进行技术革新，先后自制了部分机床、钻床、刨床、插床和检测用的工卡模具等专用设备，使工厂的生产得到了较大的发展。

１９７１年，省里投资２９．５万元，在衡东新县城北郊

兴建厂房（厂址范围为10万多平方米），1972年，农机修造厂职工120多人从原衡山城关迁来新厂房（即现在的机油泵厂），以生产机油泵为主，兼搞农机修造。

1973年，在上马搞树脂厂未成的基础上，衡东县新建农机二厂，农机修造厂改名为“衡东县第一农业机械厂”，主要任务是生产机油泵，并且是省机械局的定点生产的厂子。此后，省机械局逐年扶助，先后投资百余万元，添置各种专用机床设备近百台，实现了机油泵生产加工机械化一条龙。1975年，这个厂产机油泵43400台，产值超百万元，比1970年增长98%。

1976年，县里有关部门要求这个厂生产175型柴油机，该厂只得自筹资金，增添设备，增加人员。但是，柴油机生产上马后，严重影响了机油泵的产量和质量，经济效益显著下降，企业遇到了暂时的困难。

（四）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全党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党中央制定了一系列方针政策，给企业带来了活力。县农机一厂于1979年果断地停止了175型柴油机的生产，同时对企业内部进行调整、挖潜，狠抓机油泵产品质量，坚持“质量第一，用户至上”的原则，逐步赢得了信誉，经济效益很快提高。

1980年县农机二厂下马，100多名职工纳入农机一厂，一厂规模再一次扩大。1981年，县农机一厂正式命名为“衡东县机油泵厂”，并保留农机厂的牌子。次年，生产的机油泵达7·8万台，产值138·1万元，获利税7·5万

元。

1983年，衡东县机油泵厂围绕增强企业活力，狠抓企业内部体制改革这一中心，通过政企分开、简政放权、层层承包等形式，落实内部生产经营责任制，使企业由单纯的生产型，逐步转化为生产经营开拓型。这样一来，生产发展很快，产量、质量都有较大幅度的提高。1985年，这个厂生产机油泵18·1万台，完成产值260.35万元，实现利税49.81万元。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衡东县机油泵厂的规模也不断扩大，技术改造不断加强，职工队伍素质不断提高，企业的生产直线上升。1988年，生产的机油泵已达28万台，产值400万元，比1980年增长5.7倍，实现税利122.46万元，比1980年增长20.41倍。产品畅销全国28个省、市、自治区的36家柴油机主机厂和500多家农业机械公司，并且随主机远销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加拿大等国家，又还有少量机油泵直接出口。同年，衡东机油泵厂荣获“省级先进企业”光荣称号。1989年上国家二级已通过检查验收。

现在这个厂有7个车间，21个班组，厂房和宿舍建筑面积为2.7万多平方米。

周晓衡　廖夫奇整理

回忆原衡山的农业合作化运动

罗　辉　　曹德荪

原衡山县（其范围包括今衡山县、衡东县、南岳区）的农业合作化运动，论历程，是从互助组起经过初级社到高级社的，论时间，是从1951年至1957年。当新中国建国40周年之际，我们回忆起来，认为农业合作化运动的艰苦奋斗历程在农业发展史上实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历史功绩是不会被人们淡忘的。

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发展过程

农业合作化运动，是土地改革结束以后逐步发展起来的。原衡山县于1950年开始土改，在全县分为五批进行，第一批当年结束，第五批结束于1952年。土改给农民分到了土地，促进了生产的发展。但是，在发展生产过程中，农村两极分化的情况越来越明显；富裕户有余钱剩米；贫苦农民原来底子薄，虽然分得了田土，却缺耕牛，缺农具，缺资金，缺口粮。特别是人多劳少户和贫病交加户，困难更大。土改结束才两年，农村就出现了贫苦农民卖青苗、借高利贷、甚至出卖土地的情况。1952年，第五区（大浦）出卖耕牛的就有27

罗辉：原衡山县农村工作部部长，现任衡山县政协主席。
曹德荪：原衡山县农村工作部干事，现任中共衡东县委副县级调研员。

户，出卖土地的有５３户。早在１９５１年底，中共中央就颁发了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决议的试行草案。决议指出：在我国农村完成土地改革以后，必须按照自愿和互利的原则，积极领导农民走互助合作化的道路。并且提出了互助合作的三种主要形式：临时互助组、常年互助组和以土地入股为特点的农业生产合作社。

按照中共中央的指示，在全面进行土地改革的同时，各地普遍开展了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宣传教育，报纸上宣传山西省李顺达办互助组，我们宣传苏联办的集体农庄："耕田不用牛，点灯不用油"，"楼上楼下，电灯电话"。县人民政府印发了毛泽东同志《组织起来》的小册子，农村墙壁上，到处写有"组织起来，发展生产"和"组织起来，是由穷变富的必由之路"的石灰字大幅醒目标语，向农民指明前进的方向，给农民以极大鼓舞。１９５１年第一批土改结束以后，全县就出现了１０个常年互助组和４０个临时互助组。所谓临时互助组，就是临时凑合的劳动班子，你帮我几天工，我帮你几天工，农民说这是"告①工抓背"，"借盐盅告盅，借米升告升"；常年互助组则比临时互助组进了一步，主要农活是集体劳动，有固定的劳动班子，建立了"日清月结"的清工结帐制度，即以工抵工外，按照"自愿互利，等价交换"的原则，出工少的，就要拿钱出来付工钱。至１９５２年，这种常年互助组发展到１５６８个，参加的有１．２万多户，占全县农户总数的８％；１９５３年，又发展到４０５４个，参加的有３．７万多户，占总农户的２５％。当时全县著名的互助组有店门区的康菊英、阳厚敦互助组，白果区的周仁六、李作五互助组，吴集区的周祖芒、廖焕坤互助组，大浦区的陈光林、陈衍忠互助组，沙泉区的曹秋高互助组等。在发展互助组的同时，１９５３

年春，康菊英互助组和周仁六互助组试办了以土地入股为特点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当年获得大丰收。康菊英社当时由12户组成，粮食亩产278公斤，比丰收的1952年亩产225公斤，增产23.55%，而当地最好的李长桂互助组，亩产只有253.5公斤，当地生产条件最好的单干户李谭生户，亩产只有217.5公斤。群众一致公认：互助组硬是比单干好，合作社又比互助组强。是年3月，中共中央正式公布了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领导也有了试点经验，年底又新建了柿竹园（店门）、水濂洞（南岳）、平田（大浦）、枫木塘（大浦）、拜朝（霞流）等5个初级社。在各地试点的影响下，1954年，许多互助组纷纷要求转为农业社。结果，我们只“批准”了22个社。1955年，农业社普遍获得丰收，秋后，又“批准”了226个社。至此，全县共有农业社253个，入社农户7846户，占总农户5%多（衡东地方有农业社140个，入社农户为4840户，占衡东地方总户数的5.29%）。此外，有63个互助组没有经过“批准”就自动办起了农业社，我们把这些社叫做“自发社”。对这种“自发社”，县里不予承认，动员“解散”，这就是后来批评的“砍合作社”的由来。

1955年7月，毛泽东同志作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他说：“在全国农村中，新的社会主义群众运动的高潮就要到来。我们的某些同志却象一个小脚女人，东摇西摆地在那里走路，老是埋怨旁人说：走快了，走快了。过多的评头品足，不适当的埋怨，无穷的忧虑，数不尽的清规戒律，以为这是指导农村中社会主义群众运动的正确方针。否，这不是正确的方针，这是错误的方针。”

当时，除已经建立的农业社外，全县还有常年互助组12956个，参加的农户有9万多，约占全县农户总数62%。在此以前，主管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县委农村工作部曾一度设想，要在1956年让全县农户总数的30%，即加入互助组的农户一半左右转入农业生产合作社，这显然与毛泽东同志报告的精神不符。接着，《人民日报》发表了《水到渠成，瓜熟蒂落》的通讯，毛泽东同志又为出版《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写了序言，并在每篇文章的前面写了《按语》，推介全国各地农业合作化运动的经验。于是，8月间，县里重新规划：1956年全县入社农户达到农户总数75%～80%，基本实现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农业合作化。11月，县委召开合作化扩干大会，响亮地提出“书记动手，全党办社”的口号，批判“建社难，办社更难”、“发展难，巩固更难”等右倾思想，因此，全县迅速掀起了建社高潮。1955年底，新建社1051个，加上老社共有1504个，入社农户11万多户，占总农户76%，提前一年实现了规划。从试办社的情况看，“土地劳力按一定比例分成”，影响社员劳动积极性；农业社的规模小，不利于农田水利基本建设；考虑到农业机械化，必须打破土地界限。在当时地委秘书长宁生同志、地委农村工作部长刘东安同志的指导下，1955冬，全县办了两个高级社的试点：一是店门的横岳乡由1120户组成的祝融峰社，一是霞流的宋桥乡由570户组成的宋桥社。因为宁生同志和刘东安同志都曾先后担任过原衡山县委书记，而且宁生同志蹲的点是康菊英互助组，即后来的康菊英社、祝融峰社；刘东安同志蹲的点是陈光林互助组，即后来的辉朝社、宋桥社。他们很清楚这两个社的情况，认为办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